坚持民间写作的作家

——读浦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

■陈思和

浦子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在当代文坛上有着独特地位的作家。他的“王庄三部曲”以虚拟的浙东山海县王庄为背景，以百年历史、百位人物、百万文字，尽揽浙东人民的生存状态与风土民情，不愧被人称为“浙东人的精神图像与中国历史的生死场”。

浦子创作的长处是写民间故事，擅长于将民间故事的想象力和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起来，由此透露出沉重的文化反思气息。这与我的研究兴趣比较相近。我在阅读第一部《龙窑》的过程中，思路常常中断，有点捉摸不透小说的内涵，总觉得这样理解不对，那样理解也不对。浦子的小说语言非常特殊，有点啰嗦，过于民间化，好些方言得花功夫仔细品嚼才能琢磨得透。后来我无意间看了严锋推荐的一本畅销书《圣殿春秋》，突然意识到“王庄三部曲”和畅销书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思路一下子就通了。浦子和我们这代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不同的是在知识背景上，我们大多数作家是站在接受了新文学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去写民间，而浦子则是站在老百姓中间写作的。读他的小说，就好像是在听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讲他们村里的那些事儿。如果是一个文人写作，他的语言可以写得很漂亮，小说也可能会很畅销。但浦子的小说很难畅销，哪怕他的故事是飘逸的，但叙述中带有很多本乡本土的沉重话题，比如人性的阴暗狠毒，民间社会中封建文化积累而造成的负面因素，这都使得他的小说无法成为轻浮的畅销书。但就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浦子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坚持民间写作的作家。

浦子的“王庄三部曲”，每部小说都带动一段大历史。第一部写晚清时期现代性侵入中国后带来的社会震动。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人物王世民身上包含了许多西方元素：他的记忆深处有一些外语字母，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隐含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等价交换的概念）等，这些新东西都是原来的大清王朝治理下的王庄所没有的，这些细节极具象征意味。如果把王庄比喻作中国社会的象征，它写出了晚清时候西方新思想（象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欲望）的不断涌进，瓦解了原来的旧中国的道德支柱。浦子是以生动的民间寓言文体来讲述中国式的现代文明如何产生，完全避免了概念化、雷同化，成为一种成功的中国故事和中国书写。比如说，《龙窑》一开头那个来历不明的王世民所代表的新生命，一旦和腐朽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后，马上也会腐烂起来。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经验。《龙窑》不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故事背后还有微言大义。他的三部作品分别可以理解成是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革命的中国。《龙窑》写的是晚清社会，天高皇帝远，政治

“王庄三部曲”
《龙窑》《独山》《火中》
浦 子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制度无法约束他们，王庄有着自己的社会宗法；《独山》写的是民国，中国开始走向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大中》与新中国六十余年历史贴身而行，写出了历史的沉浮。

浦子的写作没有界限，浩浩瀚瀚，任凭你去自由想象。这种自由的阅读体验给予了评论者多重的阐释空间。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传神地写出了中国旧社会的农民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民族，他们只知道“官”“民”“匪”这三个模糊概念，故事充满了混沌状态。浦子笔下的人物能够自由转换身份，没有自己固定的社会位置，一会儿是“匪”，一会儿又变成“官”了。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旧社会的“匪”，通常都是农民造反者，逼上梁山，代表着一种比较原始的、野蛮的、粗鲁的文化。而“官”代表着当时的政治权力与国家秩序，两者原来是对立的，可是在浦子的小说里，官匪本来是一家，官也不杀匪，反而去通风报信救了匪，这样的故事就变得非常荒诞，但很有意思。我们要谈民间，就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去解释民间，浦子的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概念，也没有绝对的坏人，都是人性自由、精力旺盛的人。这种人的自由感的背后有民间社会中的一些伦理因素在支撑着。我想这是“王庄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

浦子小说是自由的，但丝毫不能让读者感到轻松，反而给人渗入骨子里的压抑感，好像自由被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压制住。《龙窑》的主人公王世民被女人救了，点燃了他的爱欲，他的生命之火总是要烧完的，所以就生了个儿子叫王传达。我认为这个情节富有涵义，像是生命密码生生不息地往下传递。所以在读第二部《独山》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王传达这个人物，想知道浦子怎么构思这个能够“传达”王世民神话的人物。然而在《独山》里，王传达到了民国时代（已经进入现代时期），王世民神话就变成了一种幻想，有点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压抑”，神话精神最后生成了艺术——他那不可能实现的神话升华成了艺术的产物。我始终存有一个疑问，王传达是王世民留下的正统火种，但在他身上却看不到王世民那种巨大的生命力。王世民的遗传因子到了王传达这一代分成了两面：一面是王传达，一面是通过他的对手王传本来展现。王传达表面上是一个正人君子，温文儒雅，满口仁义道德，但讲出来的东西都是虚伪的、过时的封建正统观念。恰恰相反，王传本自私自利，渴望金钱，所有的生存意义就是向王传达复仇，为了复仇，他不断地折磨王传达，却始终不愿让他死掉，享受着猫捉老鼠的快感。他做尽坏事，盘旋在黑道白道，没有是非观念，但他身上却有一种根植于与整个民国政府的政治体制相对立的活力，这种活力是承续了王世民强健的生命能力。

小说处理得最好的一段就是写王传达和日本女人之间的关系，能够上升到中国文化跟日本文化之间的关联，写得如梦如醉。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日本儿子是乱伦的结果，但从政治来说，王传达有汉奸嫌疑。要是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则中日文化之间的感情纽带、历史纠结都融入其中。王传达和王传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是小说当中最值得解读的。

总的说来，我觉得浦子是一位比较理想的坚持民间写作的当代作家，“王庄三部曲”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

史家笔法 圆梦大作

■丁 帆

这里的“圆梦”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陆建华先生评说汪曾祺一生的文学圆梦故事；二是《汪曾祺的圆梦之路》的作者本人圆了几十年来为汪曾祺作大传之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建华就开始对同乡作家汪曾祺进行跟踪研究，同时也留心收集汪曾祺的所有文史与生活资料，因此其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汪曾祺的资料丛书和研究书籍，也就不足为怪了。大约是汪曾祺的一句“我的家乡在高邮”，便触动了陆先生将其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注在“这一个”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上了。就我目力所至，当下海内外研究和蒐集汪曾祺资料最齐全的学者应该数陆建华为第一人了，堪称“汪曾祺研究的活字典”。因此，陆先生不顾年届耄耋之年，再次重新改写汪曾祺大传，以补充大量的史料为动力，以进一步完善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历史为旨归，为世人还原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立体、更加有趣、更加真实的汪曾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鉴于此，作为与陆建华交往几十年的文友，同时也作为汪曾祺作品的热爱者，我当然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汪曾祺作品的敬意，以及对这个传统文人性格中种种幽默谐趣的行为表示情有独钟的欣赏。更当然的是，我对陆建华的圆梦执着表示由衷的敬佩。

其实，我在汪曾祺家乡高邮的邻县宝应县插队生活过六年，对那里的湖荡水泊十分熟谙，所以读汪氏的作品倍感亲切，亦如陆建华对其家乡的钟爱一样，它是汪曾祺文学创作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两千多年来，大运河用她甜美的乳汁哺育了两岸无数的田野、村庄、城镇，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单说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清江至扬州段古称邗沟，通称里运河。在长不过200公里的运河两岸，就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正是在这样对家乡的深刻眷恋之情里，让陆建华从汪曾祺那里找到了共同构筑文学之梦的交汇坐标，让他们保持了多年的交往，成就了这部评传的书写。所以，我以为，如其说这是陆建华独著的专著，还不如说这就是汪曾祺自己在扮演着那个幕后的台词提示者，陆建华遵照提示的台词，记录下来了一部信史度较高的评传著述。

在浩瀚的史料当中，要写的东西很多，如何剪裁，当是每一个作传记者的困顿之处。按照时序的写法应该是传记最简便，也最符合逻辑条理的写法。此书当然亦是如此，把汪曾祺的每一个时段“有意味的”历史足迹一一呈现出来，并加以评述，这正是陆建华所需要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书清晰的脉络，这也正好契合了汪曾祺起起伏伏、起承转合的坎坷一生，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中获得一种沉入凝思的哲理层面，或许这才是作者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吧。

全书开始就写家世，这是传记的定法，洋洋洒洒的家庭背景写下来，其实最能打动读者的就是汪曾祺青春萌动期时的文学之梦的书写，当然这也是开篇文章之“文眼”：“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由此入壳，看出了汪曾祺一生创作的风格和路数，当为点睛之笔。

作为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读者的期待视野关注的是人物在大时代中沉浮的命运，而在命运的沉浮中关心的却是人物的性格，在性格的书写中，又更加关心人物的那些有着传奇色彩的有趣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陆建华在叙述故事时是用了一番苦心的，许多评断也是十分准确的。如“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他不乏爱国热情，却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做潇洒的才子。”从某种角度来说，一段好的评断，往往能够将事件的叙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理层面，在这一点上，本书不乏亮点。

我一再主张评传的写作应该遵循以史实为基础，以想象还原历史现场的“两原则”，即：评传应该把基本史实作为行文的前提，也就是说，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的过程是不能有任何虚构的成分；而在事件过程中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和表情神态等细节则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一定要符合当时历史的背景和人物所处的情境和语境。就此而言，陆建华在书中是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的。如在描写汪曾祺恋爱中的情人时，陆建华采用了“外视角”的叙述方法，

《汪曾祺的圆梦之路》
陆建华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汪曾祺的眼光来观察其恋人就是一例：“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这里的“外视角叙述”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描写，像这样能够提升阅读效果的文字比比皆是，虽很简洁，却很摄魂。

大约是因为评传带有强烈的学理色彩，陆建华较少涉猎汪曾祺生活当中最富有趣味的那些趣闻轶事，我猜想，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这些素材让给了他的另一位同为高邮同乡的“汪迷”金实秋先生了。他只是在结尾处书写了这样一些十分有趣味的故事，为汪曾祺的性情平添了诱人的色彩。

毋庸置疑，陆建华倘若把汪氏的菜肴写得更有滋有味，把一个嗜酒如命的汪曾祺写得更活灵活现，无疑会给本书更加增光添彩。殊不知，对于一个一生都离不开杜康的酒徒而言，汪曾祺生活和创作中的人性与风格都在此中得到了深度的呈现。其实，我以为陆建华是具备这种丰富的文学想象能力的，只是他太追求学术和学理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所以才没有充分展示其艺术的才华。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乃为憾事也。